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 同一性”问题的申诉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是从高级党校课堂教学对这个命题的理解有分歧而引起的。这个争论前后拖的时间很长。现在先把我的认识概括地说明一下，然后详细申述我的理由。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与“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是两个不同的命题，二者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命题的意思是说，思维和存在是同一个东西。例如黑格尔认为思维即存在，存在即思维，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这个命题在哲学史上，就只有这一种解释，没有第二种解释。这个命题一直是唯心主义的，没有用来作为唯物主义的命题的。

“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这个命题的意思是说，思维和存在之间有联系，是把唯物辩证法的矛盾的同一性的原理应用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上。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讲，农民从失去土地到取得土地，有一道由此达彼的桥梁，哲学上名之曰同一性。把这条原理应用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上，那就是，由存在到思维，由思维到存在，或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哲学上名之曰同一性。这条桥梁就是实践。

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命题中的“同一性”就是等同性。“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这个“同一性”是说的思维和存在之间有一条互相过渡的桥梁。两个“同一性”，虽然字面上是一样的，但含义却完全不同。绝对不能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与“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命题混为一谈。前者是唯心主义的命题，后者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命题。

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明确提出“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这个命题，这是一个完全新的命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上是一个新提法。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或列宁，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上，都没有这样提过。

一、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

远在一九五一年，毛主席的《矛盾论》公开发表约半年后，苏联哲学家罗森塔尔就写文章反对。罗森塔尔的文章译登在那时出版的《学习译丛》上。当时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的同志们看了罗森塔尔的文章都很气愤，表示反对。只有一个人，看了罗森塔尔的文章后，叫着说，毛主席的《矛盾论》错了，苏联哲学家有人写文章反对。大家不同意他的意见。罗森塔尔的文章，现在我手边没有，只记得他主要是反对毛主席关于“矛盾同一性”的理论。他说列宁从来没有讲过矛盾的同一，云云。我那时看了罗森塔尔的文章，感到有些奇怪。罗森塔尔为什么竟然这样说呢？一九五四年还是五五年，罗森塔尔与尤金合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中译本出版了，其中“同一性”条，就是反对毛主席的观点。罗森塔尔根本不懂得毛主席关于“矛盾同一性”的理论，他只懂得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

的同一性”那个“同一性”的概念。他用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那个同一性的概念，即：思维就是存在，存在就是思维，思维和存在是同一个东西，去歪曲毛主席关于“矛盾同一性”的理论。由于他把两个含义绝然不同的“同一性”混为一谈，反而说毛主席是“滥用黑格尔的术语”。他说，有人胡说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同一的，战争与和平是同一的，生与死是同一的，等等。罗森塔尔完全是曲解。毛主席有好几次在党的会议上都提到了，说《简明哲学辞典》上“同一性”条是反对他的。毛主席还说，矛盾着的事物，没有同一性，就不能互相转化。毛主席举战争与和平的转化作例子，说朝鲜战场上，中朝为一方，美帝为一方，为什么能在板门店坐下来谈判？就是因为双方都有不想再打下去的意思，这就有了同一性。有了同一性，才使战争转化为和平。这个例子，毛主席不止讲过一次。很明显，毛主席在这里说的“同一性”，还是桥梁的意思，即由战争到和平，有一道由此达彼的桥梁。毛主席说的是战争与和平之间有同一性。这同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命题中所讲的“同一性”术语有什么相干呢？而罗森塔尔竟然说，有人说战争与和平是同一的（同一个东西）。

这里先肯定下来：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命题中的“同一性”是黑格尔的术语，是等同的意思。毛主席所讲的“矛盾的同一性”中的“同一性”这个术语，是说的矛盾双方之间的桥梁的意思，即矛盾双方之间，在一定条件下有同一性，这同黑格尔所讲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中的“同一性”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毫不相干的两回事。

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从来就是唯心主义的命题

这里还要肯定一点：根据历史事实，“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命题，在哲学史上，一直是唯心主义的命题，不是唯物主义的命题，没有哪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家使用或承认过这个命题。这个命题不是到了黑格尔时才提出来的，古代希腊的哲学家巴门尼德就早提出了这个命题。到了十八世纪上半叶，英国大主教、主观唯心主义者贝克莱也使用了这个命题。十八世纪下半叶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主观唯心主义者费希特，客观唯心主义者谢林、黑格尔都使用了这个命题。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马赫派主观唯心主义者，又使用了这个命题。这个命题中的“同一性”这个概念，是“同一个东西”的意思。所谓“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说的“思维和存在是同一个东西”的意思。这个命题在哲学史上没有第二种解释，这只要考查一下哲学史，就可以知道的。普列汉诺夫与拉法格都曾说过，唯物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使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种唯心主义的词句。他们这样说，在哲学史上是有充分根据的。他们讲这个问题的几篇文章，都是列宁肯定了的，是正确的。

还有一点需要肯定下来的：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由马克思提出而以后又为列宁所发展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意识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毛主席在《辩证法唯物论提纲》中说，只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

识论,反映论,才是唯一能够正确认识世界的方法(没有原书在手边,这里只能略述大意)。毛主席在这里还说,认识论的任务在于既要反对不可知论,又要反对直率实在论,而要坚持反映论,康德的不可知论就是二元论,直率实在论(即素朴实在论)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论。康德的二元论把思维和存在绝对对立起来,认为思维与存在之间根本没有互相过渡的桥梁,认为世界是根本不可能被认识的,所以成为不可知论。同一论认为思维即存在,存在即思维,思维与存在是同一个东西,这样就根本用不着互相过渡的桥梁。黑格尔认为,世界就是他的绝对观念的化身(外化或异在),认识了他的思想,他的绝对观念,就是认识了世界。但他的绝对观念终究不是现实世界,认识了绝对观念,还是没有认识现实世界。所以凭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是不能达到认识世界的目的的。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才在思维与存在之间架起了一道由此达彼的桥梁,而成为人类唯一能够正确认识现实世界的工具。

三、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 问题争论的过程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开始是从课堂教学中对这个命题有不同的理解引起的。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第二章中阐述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能不能认识世界的问题。他认为人的思维是能够正确反映周围世界的,世界是能够被认识的。他指出,能否认识世界的问题,不

仅唯物主义者给予肯定的回答，而且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也给予肯定的回答。彻底的唯心主义者怎么也肯定了世界是能够被认识的？恩格斯就举了黑格尔作例，说黑格尔就是根据他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理论，肯定世界是能够被认识的。恩格斯引用这句话时，前边还特别加上“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句话。这里的所谓“哲学的语言”，指的就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语言。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常常不提黑格尔的名字，只提哲学是怎样说的。了解当时情况的读者，决不会误解为是马克思、恩格斯用自己的哲学语言来说的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的这个地方，引用了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唯心主义的命题后，下文紧接着就解释黑格尔怎样根据他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理论承认世界是能够被认识的。黑格尔认为思维和存在是同一个东西，世界就是他的绝对观念的外化或异在。绝对观念实质上就是黑格尔自己的思想，世界就是由黑格尔的思想创造出来的，他能够认识他自己的思想，当然也就能认识他的思想所创造出来的世界。恩格斯解释了这一点之后，接着又说，黑格尔既然承认他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理论是正确的，他就要根据他的这个世界观去改造世界。

黑格尔怎样按照他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去改造世界呢？这可由黑格尔的及门弟子鲍威尔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思想、言论、行动反映出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揭露和批判了鲍威尔怎样根据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理论去改造世界的。鲍威尔欺骗工人阶级说，工人阶级只要在思想上认为自己已经解放了，他们就获得解放了，只要在思想上认为资本消灭了，那就不再有了，只要在思想上认为不

受剥削了，他们就不再受剥削了，如此等等。马克思则说，群众的共产主义者即工人阶级，从他们的实际生活的体验中认识到思维与存在不是同一的（手边没有书，只略述大意）。从这里不难理解，“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是彻头彻尾的、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的理论，是资产阶级哲学家反对阶级斗争、欺骗工人阶级，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反动理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理论实质就是如此。正因为这样，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的四十年代，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资产阶级的反动哲学理论，坚决地、彻底地否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对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的批判，是贯彻始终的。

在这里肯定一点：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是反对阶级斗争，欺骗工人阶级，为资产阶级效劳的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理论。这个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理论，在十九世纪的四十年代，已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批判了。这是不可更改的历史事实。

一九五五年，中央党校研究班学习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哲学教研室的干部作辅导。他们没有弄清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句话的意思，也没有读懂恩格斯讲这个问题的那一段文章。他们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句话是恩格斯的话，是唯物主义的理论。或者说，这句话虽是黑格尔说的，但恩格斯肯定了这句话。或者说，这句话既可以作唯心主义的解释，也可以作唯物主义的解释。或者说，“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这个“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恩格斯的话，下文“黑格尔从他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论证中……”，这个“思维和

存在的同一性”才是黑格尔的话。或者说，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同一性是“有差别的同一性”。如此等等。我不同意他们的这些讲法，我认为他们的这些讲法都是错误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就是从这里引起的。

一九五七年，《光明日报·哲学副刊》登了一些讨论“不可知论”的文章，有的人就用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来阐述世界是可知的，并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的理论。一九五八年初，《哲学研究》发表了郭月争的文章，这篇文章提出了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应当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命题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或者说，把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即认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概括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简洁的、准确的。有人写文章赞同这个观点。

一九五八年夏天，陈伯达告诉我说，《简明哲学辞典》上“同一性”条是反对毛主席的，那一条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应当写文章批判，并叫我写一篇。为了批判前面提到的罗森塔尔曲解毛主席的观点，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这篇文章主要是为了反对罗森塔尔的。我认为把这两个“同一性”的概念严格地区别开了，就驳斥了罗森塔尔的所谓“滥用黑格尔的术语”这一胡言乱语。又因为当时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的某些人中和外边哲学刊物上的某些论文，对于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认识，例如把这个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理论，硬要说成是唯物主义的理论，或者硬要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论代替反映论，等等，所以我在写这篇文章时，用了很大的篇幅先来说明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是唯心主义的理论，

不是唯物主义的理论，更不能用同一论代替反映论。然后写了关于矛盾的统一性理论，说明矛盾双方有统一性才能构成矛盾等等。原来罗森塔尔不仅是用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中所讲的“统一性”概念来混淆“矛盾的统一性”中所讲的“统一性”概念，而且他还根本否认矛盾着的事物之间有统一性。他把矛盾双方绝对地对立起来，是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因当时争论的问题不是思维和存在有没有统一性的问题，所以我的文章就没有论述“思维和存在有统一性”及思维和存在互相过渡的“桥梁”这个问题。

康生看了我的稿子后，问毛主席：思维和存在有没有统一性？毛主席说：“思维和存在有统一性”。康生告诉了我，我感到，原来争论的是，思维和存在是不是同一的，现在问的是思维和存在有没有统一性。问题的提法改变了，问题的性质和内容也就改变了。这是两个绝然不同的问题。

一九五九年十月，于世诚写了反驳赞成“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的文章，稿子投给《光明日报·哲学副刊》。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的王哲民是这个专刊的编辑之一，他把于世诚的稿子拿给我看。于世诚的稿子主要是讲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是唯心主义理论，不是唯物主义理论，他不同意郭月争要用同一论代替反映论的观点。我觉得于世诚的根本观点是对的，只有一个论点是不对的，即没有分清“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和“矛盾的统一性”二者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因而他在反对唯心主义“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时，否认了“思维和存在有统一性”。在“思维和存在有统一性”的问题上，李唯一在一开始就承认在实践过程中，“思维和存在有统一性”。这有他的文章作证。腾云起在他的文章中也承认“思

维和存在有同一性”。于世诚在第一篇文章中的那个错误，经过李唯一对他的批评之后，他认识了这个问题，承认了“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并公开地作了自我批评。但这些论述“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文章都还没有深入地详细论述思维和存在之间的桥梁问题，他们写的文章争论的重点，都还放在说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论，不是唯物论上边，放在反对用同一论代替反映论上边。李唯一的主要观点是要为保卫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而斗争的，他反对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一唯心主义理论来代替唯物主义反映论。他们都反对艾思奇的两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文章。我们在一块议论过艾思奇，这是事实。但绝对没有在一块反对过毛主席，这也是事实。至今，我仍然认为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代替反映论，确实是错误的，而且是违反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的。毛主席明白地说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唯一正确地解决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毛主席还教导说，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任务就是要坚持既反对二元论，也反对同一论。因此，用同一论代替反映论的观点是违反毛主席的思想的。我说不要在哲学根本问题上标新立异，就是指这个问题说的。不记得是一九六几年，艾思奇发表了《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文章，以后又发表《再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文章。人们说这两篇文章是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争论的“结论”。若真的说艾思奇的这两篇文章是这场争论的“结论”，那么，我要说他的“结论”是不正确的，其中包含着许多原则性的错误，应该认真清算。

艾思奇混淆唯心主义命题和唯物辩证法 命题的界限，是原则性的错误

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明确地提出“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命题，这是毛主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来的，推进了对思维和存在的辩证关系的研究。在哲学史上，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是资产阶级哲学家欺骗工人阶级，为资本家效劳的唯心主义反动理论，因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理论，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理论，在思想上没有任何渊源关系。艾思奇想用“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论点，来说明毛主席的“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提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完全错误的。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恩格斯根本没有肯定过“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恰恰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他们合著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两部名著中，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给了致命的批判，作了彻底的否定。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说，工人阶级从亲身体验中认识到思维和存在不是同一的。经过十九世纪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没有说过他们在四十年代否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是否定错了，那么，怎么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恩格斯写《费尔巴哈论》时，把他们在四十年代已经彻底否定了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种资产阶级反动理论，又肯定起来呢？七十年代恩格斯写《反杜林论》，马克思是赞同的，有一章还是马克思写的。恩格斯批评杜林从思想中，从先验的模式、范畴中来构造现实世界时，明确

地指出杜林完全象个叫做黑格尔的人，批评杜林企图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去证明任何思维产物的现实性，这正是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所说的最荒唐的热昏的胡话之一。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论，始终是持批判态度的。怎能设想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就反转过来，去肯定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反动理论呢？这纯粹是把想象当事实！事实是，恩格斯根本没有肯定过“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艾思奇在这个问题上的一切说法，都是没有任何事实作根据的，都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相违背的。

艾思奇说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他拿出了两个“根据”。一个是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上讲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方面那一段文章，一个是恩格斯在一八九五年三月给康·施米特的一封信。这两处恩格斯都引用了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句话。很有趣的是，艾思奇把“引用”与“肯定”看作是同一的，以为引用便是肯定。他根本不去研究一下恩格斯在这个地方引用这句话的作用是什么。他认为是恩格斯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根据的这两篇文章，艾思奇是根本没有读懂的。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肯定的是世界能够被认识，而不是肯定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在那个地方引用了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只是为了说明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是用他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来肯定世界是能够被认识的。恩格斯的这段文章，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全文引用了，独独删去了“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句话，艾思奇说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岂不是落了空吗？关于恩格斯给康·施米特的那封信，艾思奇误解得更为出奇。恩格斯在

这封信中，又引了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句话，恩格斯在这里恰恰是否定这句话的，而艾思奇却说恩格斯肯定了这句话。原来康·施米特是一个最新实证论者，他完全否认马克思所阐述的利润率是对现实的正确反映，他要求利润率与现实利润要绝对相等，要求地租率与现实地租要绝对符合。恩格斯在给施米特的信中说，要求利润率在小数点后一百位数字都完全相同，这在现实企业中连两家这样的例子也找不到。施米特给恩格斯的信没有见到，大概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曾举了圆与多边形的关系作例子。恩格斯说在一定条件下，曲线与直线是等同的，相等的，这一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有好几处讲到过。因此，恩格斯在信中说，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正切合于你所说的圆与多边形的关系，云云。这里很明显，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等同性，施米特要求利润率要小数点后一百位数字都相同，这是要求利润率与现实利润的等同论，要求地租率与现实地租绝对符合，这是要求地租率与现实地租的等同论。恩格斯是肯定施米特的观点吗？不是的，恩格斯是否定施米特的观点的。就在恩格斯引了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句话的那一段中，恩格斯说，概念不是现实，但概念能够正确反映现实，概念之所以成为概念，就是因为概念有它自己的特性，它不是直接成为现实，可是你不能因为它不直接成为现实而否认它是现实的正确反映。恩格斯在这里正是直接否定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把恩格斯否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硬要说成恩格斯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错到什么地方去了？艾思奇一直错误地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唯心主义理论，硬要说成是唯物主义理论。

一九〇八年列宁在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时候，曾引用了拉法格在一九〇〇年所写的文章中的一段话。拉法格说，拉波特硬说马克思承认“存在着观念和实在的同一性”时，他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用这种形而上学的用语。这里的“形而上学”也是指唯心主义而言的。列宁是肯定了拉法格的意见是正确的。艾思奇说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与拉法格说的是针锋相对的。因此，我说过，拉法格是恩格斯的及门弟子，受恩格斯指导了几十年，竟然不知道恩格斯在八十年代（写《费尔巴哈论》）和九十年代（致康·施米特的信）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仅仅在恩格斯逝世后的五年，就说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种唯心主义词句，而生活在恩格斯逝世后六十多年的艾思奇，却说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似乎艾思奇比拉法格更了解恩格斯，这怎能令人信服呢？现在还是值得问一问，究竟是拉法格更了解恩格斯，还是艾思奇更了解恩格斯？我说艾思奇把“引用”当作“肯定”，以为“引用”就是“肯定”，我是有事实作根据的。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间，艾思奇看到了恩格斯给康·施米特的那封信，他把书拿给我看，说恩格斯在这里又引用了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句话。恩格斯的这封信我早就看到了，我当即告他说，你再往下看一看，就是叫他看看紧接着下边恩格斯所说的概念与现实不是同一个东西那几句话。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在哲学史上，一直就是说的思维和存在是同一个东西，即等同性。艾思奇一直为黑格尔辩护，说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不是等同性，是“有差别的同一性”。这个所谓思维和存在的“有差别的同一性”，丝毫也未能改变思维和存

在等同论的实质。原来谢林讲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绝对
的同一，黑格尔认为这样讲未免太粗俗，太显眼了，不能起到欺骗
作用，黑格尔说哲学应当讲得精细一些，因此就来了一个所谓“有
差别的同一性”。所谓“有差别的同一性”，仍然把思维和存在看做
是等同的。大家都知道，黑格尔的世界就是他的绝对精神的外化和
异在，因此，他的世界，不是自在的物质世界，仍然是精神的产物。
因此，马克思说，黑格尔的“差别”不是类的差别，是一种似是而非
的差别。黑格尔的这种所谓“有差别的同一性”，只是他的同一个
绝对精神表现形式的差别。对这个乔装打扮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
性”论，早已在十九世纪的四十年代，马克思就给了彻底的批判，彻
底的否定了。不知道为什么，艾思奇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和六
十年代又把黑格尔的这个陈旧破烂拾起来作武器，还积极地为黑
格尔辩护，说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不是等同性。艾思
奇知道用“等同性的同一性”不能说明“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
问题，所以他就“改良”一下，把“等同性的同一性”改为“有差别
的同一性”，以为这样“改良”一下，就可以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
性”来说明“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问题。但这仍然是徒劳的。前边
说过，二元论，思维和存在之间根本没有桥。同一论、思维和存在是
同一个东西，根本用不着桥。那末，没有类的差别的同一性，似是
而非的差别的同一性，思维和存在仍然是同一个东西，同样是用不
着桥的。而没有桥的概念，仍然不能说明“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
的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与“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是两
个绝然不同的命题，艾思奇一直没有把这两个绝然不同的命题区
别开来，相反地，他把这两个绝然不同的命题混为一谈。谁要说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理论，他就说这是否认“思维和存

在有同一性”。前边说过，“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唯心主义理论，怎能把它解释成“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呢？这两个命题在思想体系上没有任何渊源关系或继承关系。艾思奇不懂这一点，他极力歪曲恩格斯，说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的亲密合作者恩格斯，竟然肯定了资产阶级哲学家欺骗工人阶级，反对阶级斗争，为资本家效劳的反动理论，这不是真正的奇谈怪论吗？“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在哲学史上一直是唯心主义的命题，这是历史事实，后来艾思奇等大概有所发觉，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明明白白地写着：“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是露骨的唯心主义”，“是十足的胡言乱语，是绝对反动的理论”。这怎么办呢？于是掌握着编译大权的人来保镖，偷偷地作了一件欺骗党，欺骗读者，欺骗哲学界的事情。他们在一九六〇年出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单行本时，偷偷地把书中的“同一性”这个术语改为“等同性”，这样一改，就成了“思维和存在的等同性”是露骨的唯心主义，是十足的胡言乱语，绝对反动的理论，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仍然是艾思奇们所说的唯物主义的命题。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自始至终都是批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这个同一性就是等同性，反过来说，等同性仍然是这个同一性，这两个译名在这里完全是同一个原文，同一种含义。“同一性”这个术语，在列宁的这本书中，不是一个普通的术语，而是一个中心的术语，出版这本书的单行本时，既然把书中重要的中心的术语修改了，按道理说，出版者应当有所解释，郑重地说明为什么把这个术语修改了，但出版者对此没有作任何说明。我曾问过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一位负责同志，为什么把“同一性”改为“等同性”？他说，

编译局的同志们都不同意修改，只是局长坚持修改的。经过这个偷梁换柱的修改之后，同一原文就成了这样：译为“思维和存在的等同性”才是唯心主义理论，译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成了唯物主义理论。可是译为“同一性”也好，译为“等同性”也好，都是从同一个原文翻译过来的，若把这两句译文返回原文，事情就成了这样：“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的理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理论”。有本注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书，有一个地方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论，仅仅隔了一页又说，意识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论。这说明篡改译文引起了多么严重的混乱。

早在一九五五年，在向学员辅导《费尔巴哈论》时，同意艾思奇观点的人就是这样讲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既可作唯心主义的解释，也可作唯物主义的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理论中，竟有这样模棱两可，心物通用的共同语言，这岂不也是一种真正的奇谈怪论么？艾思奇不仅是对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究竟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弄不清楚，而且又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与“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这两个含义绝然不同的命题，完全看成是同一个命题，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因此，谁若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的理论，他就说这就是不承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这就是反对“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这就是反对毛主席，等等。这就是艾思奇的逻辑。艾思奇之所以苦心孤诣地硬要拉出恩格斯，无中生有地硬要说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目的是为了肯定“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可是他不懂得，用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资产阶级的反动理论来肯定“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这个命题，不但

说不清楚思维和存在为什么有同一性的道理，而且还大大损害了这个命题，把它和唯心主义命题混淆成为一个东西了。这样一来，艾思奇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发展史弄得颠倒错乱，混乱不堪，完全破坏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历史逻辑。

艾思奇的错误观点不是偶然发生的

艾思奇是在中国颇负盛望的哲学家，怎么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原则问题上混乱到这种地步呢？不知道艾思奇哲学底细的人，是很难理解的，多少知道一点艾思奇的哲学底细的人，就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艾思奇抛出了两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文章，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这也是不以人们的善良愿望为转移的。这个“两论”乃是艾思奇的哲学水平的准确反映，是他一生的哲学成就的总结。我同艾思奇在一起共事十几年，自信对艾思奇的哲学水平多少知道一点。下边大略举出若干事实。一九五三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即毛主席指示给马列学院盖房子的那一次，中央办公厅通知我和侯维煜去参加，我们走进会场刚坐下，毛主席望着我们说，“艾思奇还在马列学院工作吗？”我们回答说，是的。毛主席又说，“艾思奇这个人，说话写文章，从来就是没有逻辑的，现在怎么样啊？”我们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好，就说，现在好一点。艾思奇的两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文章，充分地证明了毛主席对艾思奇的认识是深刻的，对他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两论”是艾思奇写文章没有逻辑的代表作。

有个知道艾思奇哲学底细的人说，艾思奇思想懒惰，从不肯花费精神劳动，去刻苦地思索问题。“两论”也是艾思奇思想懒惰的代表作。他的《大众哲学》虽经几次修改，但再版时仍有不少的原则性错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马列学院开学，一开始学习《社会发展史》，读恩格斯关于论述从猿到人的文章时，艾思奇担任讲授。他讲了一个上午，光是从生物学的观点去讲猴子怎样变成人，根本没有提到劳动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对此，我提出了意见，让一位院负责人转告。他虽然接受了，下次讲课就讲了劳动创造了人类这个观点。但不料他因此而怀恨十余年，在党委会上，在谈话中，一再说我告他的状。

一九五一年，毛主席的《矛盾论》公开发表了。艾思奇在中直党委给干部讲《矛盾论》。《矛盾论》中讲“差异就是矛盾”，下边有人递条子问，茶杯与桌子有什么矛盾，于是艾思奇便大讲起茶杯与桌子的矛盾。一直这样讲了好多年。后来他察觉了这样讲法不对，但他却批评这种讲法，说，有人讲茶杯与桌子的矛盾，云云，好象是别人这样讲的。可惜这个“有人”不是别人，正是艾思奇自己。从他大讲茶杯与桌子的矛盾，可以看出艾思奇对于矛盾的同—性原理理解的正确程度究竟怎样了。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讲的明明白白，不同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构成矛盾，没有一定条件，就没有同一性，就不能构成矛盾。茶杯与桌子之间有什么不可分的联系着的条件，有什么同一性，使它们构成矛盾呢？艾思奇不懂这一点。一九五三年，学员把艾思奇讲课中的错误提到院党委。院党委早就感觉到艾思奇在讲课中常出错，需要对他进行帮助。院党委关于艾思奇的错误的结论存在党校档案室。

那时，艾思奇把他的《大众哲学》送给中国青年出版社重印出

版，已排出了第三次的校样，就要付型了。我把他的《大众哲学》的清样借来看，看到讲事物自己运动与外力推动的问题时，有如下的一些讲法：

教场口的特务，手上拿着石头，打到民主人士的头上，这就是事物自己运动。下文又说，我们只看到过人玩木偶戏，谁看见过鬼玩木偶戏？他举这两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呢？他讲，人玩木偶戏，就是事物自己运动，鬼玩木偶戏，就是外力推动。为什么这样讲呢？原来他的根本观点是这样的：宇宙间的事物分作两大类，即精神和物质，精神对物质而言是外力。这是他的大前提。为什么说教场口的特务，手上拿着石头，打到民主人士的头上，就是事物自己运动呢？因为特务的手，石头，民主人士的头，都是“事物自己”，特务把石头“打出去”，就是“运动”，所以说，特务把手上的石头打到民主人士的头上，就叫做“事物自己运动”。人玩木偶戏也是这样，人手和木偶是“事物自己”，玩就是“运动”，所以说人玩木偶戏就是“事物自己运动”。为什么说鬼玩木偶戏就是外力推动呢？因为鬼是一种精神，精神对物质而言是“外力”，所以说鬼玩木偶戏，就是“外力推动”。根据艾思奇的这些讲法，我们来分析一下。不管怎样，我们承认艾思奇是个唯物论者，他不会相信有鬼的，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鬼玩木偶戏这样的事。那么，这样一来，事物也就没有外力推动这回事了。特务手上的石头打到民主人士的头上，和人玩木偶戏，这本来是外力推动，而艾思奇却说，这就是事物自己运动。那末，这样一来，世界上也就没有事物自己运动这回事了。就在他的书上讲这个问题不远的地方，艾思奇批判了机械唯物论，阐述了辩证唯物论，因为他是反对机械唯物论，拥护辩证唯物论的。奇怪的是，他在说明什么是机械唯物论，什么是辩

证唯物论的时候，用的词句都是差不多的，从他的说明中看不出辩证唯物论与机械唯物论的区别在什么地方，从他所理解的事物自己运动和外力推动，以及所举的例子来看，他是分不清这个界线的。一九五三年时，他还要出版这本书，并征求我的意见。我只提了一点，我拿着《大众哲学》的清样指给他看，说他在这里说明什么是机械唯物论，什么是辩证唯物论，所用的字句都是一样的，没有把问题说清楚。关于他的《大众哲学》重新出版的问题，院党委出于爱护他的诚意，为了保护他的声誉，向他建议，这本书最好是不要再重新出版了，他接受了党委的建议，这本书没有再版。

一九五四年冬，批判胡适的唯心论，艾思奇写了很长一篇文章，登载在《学习》杂志上。他的这篇文章我看了，但没有看清楚他的意思。《人民日报》要转载这篇文章，但因文章太长了，叫他大大地压缩一下。他把压缩了的稿子送给我看，这时我才看懂了他的意思。原来他在这里又把唯心主义的经验论和唯物主义的唯心论弄混淆了。胡适的经验论是唯心主义的经验论，而他批评胡适的经验论，却说胡适是把经验停留在感性认识上，没有提高到理性认识。唯心主义的经验论与唯物主义的唯心论，有着重大的原则上的区别，唯心主义的经验是主观自生的，唯物主义的唯心论是从实践中来的，这一点，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已经讲清楚了，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也是讲清楚了，可是那时候艾思奇还没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我提出了意见之后，他把稿子中讲这个问题的一大段勾掉了。这说明在一九五四年时，艾思奇还分不清唯心主义的经验论与唯物主义的唯心论。

一九五五或五六年时，艾思奇讲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把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唯心主义的命题说成是唯物主义的命题，并说这是恩格斯的话，后来知道了这是黑格尔的话，但又说恩格斯肯定了这句话，说这句话既可作唯心主义的解释，又可作唯物主义的解释。我很怀疑艾思奇搞了一辈子哲学，是否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界限划清楚了。

一九五九年，艾思奇在郑州给河南省市委一千多干部作报告，讲什么要用“四条腿走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毛主席讲两条腿走路，这是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说法，“四条腿走路”是什么规律呢？从他的这个提法，可以看出艾思奇对于两条腿走路理解的正确程度究竟如何。

一九六四年，艾思奇讲，康德的二律背反同他的二元论没有关系，并说这是哲学史上的常识。真的没有关系吗？二律背反是把矛盾的两个对立面绝对地对立起来，根本不懂得矛盾的同一性，二元论是把思维与存在绝对地对立起来，根本不懂得思维和存在之间有同一性，康德正是在他的二律背反的思想方式支配下，才产生了他的心物二元论，这怎么能说是没有关系呢？就举这些例子。这些例子都是有关辩证唯物论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这些例子很准确地反映了艾思奇的哲学的水平。因此，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艾思奇在逝世之前抛出两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那样有原则错误的文章，乃是他一生哲学成就的必然产物，是他的哲学思想发展的逻辑的必然。艾思奇在“两论”中还有些很奇怪的逻辑。他既然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的理论，他就要在一些书上找根据，但书上的根据都是反对他的论点的。他在列宁的书上找不到这样的根据，他就说，列宁虽然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的理论，但列宁没有说过“思维和存在的

同一性”不是唯物主义的理论。这是什么逻辑呢？这里连最起码的形式逻辑也不要了。艾思奇的逻辑是：列宁没有说过“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不是唯物主义的理论，那就是列宁说过或者至少是默许过“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的理论。但这样一来，事情就成了这样：列宁说过“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的理论，列宁也说过或者默许过“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的理论。这样一来，列宁的论点就同艾思奇的论点相符合了，列宁的哲学水平就降低到了艾思奇的哲学水平，于是艾思奇的哲学水平也就提高到了列宁的哲学水平。一九〇〇年前后，普列汉诺夫，当他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写过几篇批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文章。普列汉诺夫的这些文章，都是列宁肯定了的，认为他的论点是正确的。普列汉诺夫说过，谁若懂得“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真正含义是什么，谁就不会再说它是唯物主义了。普列汉诺夫的这个论点是直接反对艾思奇的论点的。艾思奇怎么对付这个论点呢？他不敢正面去对付这个论点，他用了另外一种手法去对付。他根本不顾历史事实，只说普列汉诺夫是个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说的话是不算数的。他就这样轻率地避开了普列汉诺夫的这个正确论点。一九六一年时，由于艾思奇一直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唯心主义的理论当作唯物主义的理论，讲课写文章，都是这样讲，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我曾告诉过孙定国，叫他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论述这个问题的材料收集一下，他在搞这个材料时，找了于世诚帮助他。材料收集好了之后，印成了一本《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参考资料》。这本资料都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书上摘录下来的，其中有几条是从普列汉诺夫的有关文章上摘录的，而这几篇

文章又都是列宁肯定过的。这本资料印出来之后，吓坏了艾思奇，因为这本资料中的每一条都是反对艾思奇的论点的。艾思奇怎么办？他的办法很简单，宣布这本资料是“黑书”，当时党校的负责人积极地给他撑腰，他们知道，这本资料书一经宣布为“黑书”，就没有人敢再看了，艾思奇的“两论”的观点就没有人敢再反对了，艾思奇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人们不禁要问他们：为什么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书上摘录下来的资料书，竟然成了“黑书”呢？他们到底是在反对谁呢？

我在讲课时，常讲毛主席教导说，主观与客观相一致、相符合，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关键。艾思奇攻击说，要求主观与客观一次符合，就是简单化，机械论。我只是照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去讲，我从来没有讲过要一次符合还是几次符合，艾思奇在这个问题上究竟是在反对谁呢？

到了六十年代，艾思奇还划不清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界线，分不清“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的理论还是唯物主义的理论。他的两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文章是侮辱恩格斯的，而他竟然自命为是这一场论争的“结论”，并专横地不许别人再提意见、批评和讨论。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书中摘录出来的学习资料，他竟然斥之为“黑书”。

由于把艾思奇的两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文章，作为这场争论的“结论”，并不容许再讨论这个问题了，这就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我向党声明，在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上，我不同意艾思奇的论点，并且反对他的论点，这是事实。但这决不是反对毛主席，而是坚持毛主席的观点。我同李唯一和于世诚的关系，只是一种学术研究性质的关系，就是在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有共同的认识，他们也是不同意艾思奇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唯心主义理论说成是唯物主义理论，不同意在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方面用同一论来代替反映论。

结语：原则性的争论未得出 原则性的结论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是一场原则性的争论，但没有得出原则性的结论。艾思奇的两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本身就是一种原则性的错误，不配成为这场争论的结论。艾思奇的两论侮辱了恩格斯，打乱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体系的历史逻辑，抹杀了毛主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上创造性的贡献，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我认为不应禁止批驳艾思奇的两论。

一九六四年，高级党校批判我的“合二而一”时，党校的主要负责人又提出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并把艾思奇的两论作为结论，重新印发。

我现在常常想，毛主席所教导的，凡是错误的东西必须批判。我相信，象艾思奇的两论这种错误的东西，也必须受到应得的批判，同时这里的党组织允许我写出我的意见。因此，我就鼓起勇气，把这个问题的争论过程和我的认识写了出来，作为我的交代材料，供党审查。

一点请求：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前后拖了十年之久，还没有结束，是经过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的。这个复

杂曲折的过程,我想有向党中央反映一下之必要。同时,关于“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命题,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关于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及其过程,我一直没有向毛主席陈述过;因此,我请求中央党校的党组织把我的这个交代材料,作为我向毛主席的汇报,呈交党中央、毛主席。

最后,我需要作两点声明:

1. 我没有说过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是由“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引起的这样的话。我只说过,“思想有粮就有粮,思想有钢就有钢”,说这样话的人,可能不知道“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样的唯心主义命题,但这种话在精神上却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有相似之处。

2. 交代材料中有的地方是应该引证原文,才能说得确切充分,但因没有书以资引证,只是凭自己的记忆和理解略述大意,也可能有述说错了的,由我负责任。

杨 献 珍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至四日